

燕赵 传奇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五百集本土文化系列节目

根脉文化 ①

主编◎王智

涿鹿

西柏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燕赵
传奇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五百集本土文化系列节目
根脉文化
下

王智◎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事变迁，总有一些故事可以耐人寻味；流年轮转，总有一种巧合仿佛早已注定。“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故事恰始于燕赵大地上顶天立地的一位李姓名人——李大钊。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也是新时期的领路人。

在那动荡的年代，想要撑起燕赵大地的脊梁，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这一个“中国梦”到底有多远？他愿意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这样一段路途究竟有多险？他愿意用自己的身躯来承担。在他轰轰烈烈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传奇往事？就让我们追怀一代革命先驱的光辉足迹，踏上燕赵儿女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征程。

一代人杰李大钊，在小时候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娃子，如果一定要在他的人生开端里找一段不寻常的故事，那还得从他的爷爷李如珍说起。

李大钊的老家就在河北省乐亭县的大黑坨村，他生在这，长在这，挺机灵的一个娃娃，命却像是莲子心一样苦得很。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撒手人寰，他刚刚呱呱坠地，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间，襁褓里面的李大钊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亲人，那就是年近古稀的爷爷。爷爷李如珍瞧着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养大，让他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样的想法着实是好，可要完成这么一项重大的任务，李家的老爷子他要怎么办？面对这么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李家的学前教育又要从哪入手呢？

李大钊刚满四岁的时候，爷爷就教他识文断字、背诵诗歌，还用硬纸片做成两寸见方的识字卡，用这自制的教

学工具给孙子开起了学前班。爷爷深信一句话——严是爱，松是害。他的心里对自己的小孙子是怎么疼也疼不够，可为了让他学知识、长本事，教他念书的时候还得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完不成学习任务就得挨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爷爷的耐心教导下，也靠孩子聪慧的禀赋，一两年的时间里，小小的李大钊已经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几部启蒙教材背得滚瓜烂熟，这乡里乡亲的提到这个娃娃，都竖着大拇指说：那可是个神童！

李家的爷爷虽然年纪大了，可是对于这人世间的事可是一点也不糊涂，他不光教孙儿念书识字，还教他开眼界、长见识，茶余饭后就给李大钊讲讲外面那个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说中国的皇帝有多么窝囊无能，说洋人怎么在中国的地面上为非作歹，中国人不能光挨欺负不还手，得站起来跟洋人斗，可是要怎么斗呢？还得有人来领头……

天长日久，李大钊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火种，他明白：要斗争，要反抗，救国救民，就是自己肩膀上的重任。这样的信念越来越强，即使到了后来，李大钊置身于敌人的监狱，仍然在那一篇《狱中自述》里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李大钊奋斗了一生，拼搏了一生，为的就是解放的事业，可是要刨根问底，给他的革命生涯找出开端，这个时间点又该定在哪呢？几乎所有研究李大钊生平的论著都把这个节点定在了1915年，他参加留日学生斗争，反对“二十一条”的时期，可是这样的论断一定可靠吗？难道在这之前，这位革命的先行者一直默默无闻吗？难道他眼瞧着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一直袖手旁观吗？他在根脉所系的那片故土之上，曾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风起云涌，革命斗争谁人不争先锋？

风平浪静，硝烟过后何处去探究竟？

从前，很多学者认为，李大钊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可他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李大钊的性子存着一股子河北人的实在，很多事上都是做得多说得少，他本人从来没有跟人提起

过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二是由于李大钊身份特殊，在他遇害之后，国民党政府极力抹杀了他的历史功绩。

无论如何，历史在成为历史之后，总会还原曾经的真相，其中功过是非，没人可以抹去。如今在台湾仍然保存着一则珍贵的史料《辛亥滦州起义记》，其中明确记载了李大钊参与成立革命党工合会的事迹。接受了那场斗争的洗礼，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历练，李大钊由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名民主革命的斗士。

这次发生在燕赵大地的起义之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不止李大钊一位，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将领冯玉祥。这两位昔日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国共两党内地位最高的河北人，这是燕赵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李大钊的故事是一段连着一段。1920年，李大钊牵头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研究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筹建中国共产党。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这事很快有了眉目。李大钊约上陈独秀，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展开活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页浓墨重彩的篇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至此，建党伟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可是在十三位代表当中，却没有看到李大钊的名字，这其中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通常的说法都是这样：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担任着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还领导着反对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这种种事务集于一身，李大钊实在是很忙。不过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建党的会议更加重要？再忙也总不至于耽误这样一件大事吧？

这样的问号在很多人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直到多年之后，谜底才由李大钊当年十分信任的学生、非常得力的助手罗章龙揭开。

罗章龙是毛泽东的老乡，湖南浏阳人。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与毛泽东结为好友，被被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罗章龙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1979年罗章龙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一级教授。

这位见证过历史的老人讲述了他的回忆：1921年7月，正是暑假将至的时

候，他们接到了来自上海的通知，说是要召开一次会议，可是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里面并没有说清。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尽量不要打扰百忙之中的李大钊。于是，就派出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和年轻一辈的刘仁静去做代表参加会议。

直到几十年后，当时参加会议的刘仁静还这样说：“那次会议的态度很认真，气氛也很好，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重要意义，因此使得这项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年参加会议的毛泽东、董必武等代表甚至没有一个人准确地记住了大会召开的具体日期。最后只得在商议之后，把党的生日定在了1921年7月1日，而准确的时间本应是1921年的7月23号。

对于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先驱来说，是否参与过“一大”的会议，是否见证了党的成立，这样的事情或许并不十分重要，值得铭记的是他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一生。作为燕赵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党的杰出领袖，李大钊在家乡河北的革命运动中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他为故乡的解放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说的故事。

李大钊开眼看世界，是中国头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也没忘了故乡故土，时刻把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系在心上。1919年，李大钊听人说起开了开滦煤矿里矿工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立刻提笔写就了一篇名为《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的文章，他奋笔吐衷情，向世人发出了呐喊：“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

1922年，李大钊投入到战斗的最前线，作为北方区委的负责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罢工之前，他和工人代表彻夜长谈，了解情况；罢工之中，他领导工人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最艰难的坎上，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表启事，公开谴责镇压运动的刽子手，为工人兄弟争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

李大钊和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和他们心贴心地交流，工人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心人。有一回，李大钊亲自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兄弟见面，大伙都激动地围在他的身边，整个屋子里站满了人。李大钊跟大伙说：“你们工

人并不矮，可以够得上天那么高！”他一边说着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人的“工”字，又接着在下面添了一个“人”。大家凑上来一看，哟！这不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天”字吗？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讲道：“工人的前程远大得很，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人就要当家做主人！”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潮澎湃，这样的信念就成了工人们斗争的力量源泉。

李大钊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斗争，这一番改天换地的壮举，赢得了劳苦大众的心，也遭到了反动派的恨。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在狱中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李大钊的心里却总燃着一团烈火，他严守秘密，大义凛然，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敌人眼见着在这里讨不到便宜，就恼羞成怒，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和谴责，在4月28日对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实行了残忍的绞刑。临刑前，李大钊依然壮志不屈，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李大钊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八岁。

一句高呼，前赴后继多少先驱挥洒热血？

一生未尽，丹心留史几番往事开启新篇？

如果大家提个问题，新中国第一件文物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就是那个沾满了血腥，见证了罪恶的绞刑架。是它让李大钊的生命在1927年戛然而止，但却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据说，这架刑具来自远隔重洋的外国，是专门用于绞杀革命党人的罪证。几十年后，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于世人的眼前，这个绞刑架又是从哪冒头出来的呢？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人接管国民党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迈步走进一个大屋子，里面赫然摆放着一座庞大的杀人机器——令人难毛骨悚然的绞刑架。朱文刚问了一句：“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处决过死刑犯？”

一个当班的值守回答说：“只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

像再没用过……”

“李大钊”这三个字一出现，朱文刚立刻感到情况重大，他命令在场的旧警察：“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话一说完，朱文刚立即赶往市公安局进行汇报。

这事逐层上报，一直报告给了当时的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当即指示把这座绞刑架送往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那里妥善收藏。于是，这件文物就成了新中国编号 0001 的收藏，摆在博物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

如果不是看过展品前面的文字介绍，每个人都很难把这个面目丑陋的刑具和革命先驱李大钊联系在一起。谁又能想象的到，当年反动派在搜查过程中，只从李大钊夫人的身上搜出了一块钱和一枚金戒指。这一块钱和这枚戒指是李家当时全部的家当，就连大钊先生遗体下葬的棺槨衣裳都是朋友们帮衬着解决的。

那时候，李大钊在北大担任着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双重职务，工资本来也并不算少，可他总会拿出一大部分来接济贫寒的青年，资助革命的活动。这事传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他在感动之余，特别关照会计在核发李大钊的工资之前，先扣下一部分给李夫人用作生活上的挑费，这才避免了李家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李大钊没给家人留下什么金银房产，留下的却是让每一个中国人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他一生中有众多书法墨迹留世，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也许是因为李大钊实在是太符合这个句子中的深意，很多人都认为这副对联是他本人的原创。其实，这话本来是由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那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生发而来，李大钊将下联的“辣手”字改为“妙手”，一字之差，反射出了大钊先生仁德道义的志向和追求。

同为河北老乡的明代忠臣杨继盛，因为抗御强暴、反对权奸，惨遭严嵩杀害，这一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正是他临刑之前的慷慨之作。

李大钊和杨继盛这两位燕赵乡贤，同样慷慨就义、以身殉道，同样又是文化巨人，一代宗师，可谓古今辉映，为我们河北人文精神树立了一脉相承的光辉传统。

革命先驱李大钊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红色足迹，抒写了一首慷慨悲歌。革命亦有后来人，在保定地区，一群正义的农民英雄发动了一场农民武装斗争，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一首壮丽的《红旗谱》。他们究竟是谁呢？《红旗谱》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最能表现近现代河北革命运动中农民英雄形象的艺术作品，就是《红旗谱》，因为在主人公朱老巩、朱老忠父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英雄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

大地主冯兰池要砸掉四十八村防汛筑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的凭证——古钟，私吞田地，见义勇为的朱老巩挺身而出护钟保田。

“谁敢砸钟”，朱老巩手执铡刀怒目圆睁，三两下就把地主冯兰池的红契撕成了碎片，那股刚猛凛然之气，堪称“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影片中朱老巩这一段精彩的亮相，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凌子风导演的这部电影《红旗谱》，年龄大一些的人们可能都看过。那么，《红旗谱》中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暴动发生在哪一年呢？又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电影之中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究竟是谁呢？下面我们就详细说一下。

《红旗谱》中描述的那场暴动，发生在1932年8月，是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掀起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震撼了华北地区，在河北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旗谱》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

主人公朱老忠的原型，就是暴动总指挥宋洛曙。1887

年，宋洛曙出生于蠡县宋家庄一个贫苦家庭。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八九岁就学会纺线织布，十来岁就去给地主家当长工。1927年，宋洛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常以卖油、织布、开饭馆为掩护，为共产党传递情报。

暴动前宋洛曙还日夜奔波忙碌，到处发动群众、组建队伍。很快队伍发展到三百多人，有一百二十多支枪。他带领着游击队，斗地主、砸盐店、打土豪、分粮食、烧契约，还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

高蠡暴动的发生，使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震惊，他们立即派出大部队进行围剿。在跟敌人的激战中，宋洛曙不幸中枪，壮烈牺牲。

《红旗谱》中党的领导人贾湘农是由现实中的两个人合成的，其中一个“河北红军”的政委贾振丰，另一个是支队长湘农。《红旗谱》中将“贾振丰”和“湘农”合成一个人物“贾湘农”。这两位农民领袖的事迹，直到今天还在高阳、蠡县一带传颂。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讲一段小插曲。在高蠡暴动中，有一位小战士原本被抓捕了，但是最后竟然死里逃生。谁都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他竟然成了共和国第一大案的主角。

这个小战士是谁呢？他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

原来，这个小战士就是有“红小鬼”之誉的刘青山。当年刘青山才十五岁，就参加了“高蠡暴动”第一大队，在斗争中出生入死，非常勇敢，可是在突围时被敌人俘虏了。

第三天，敌人把俘虏来的十九名红军战士押到了蠡县南关操场上，又把四个乡的老百姓轰来，开始血腥大屠杀。几把大铡刀一字排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想要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前面的十八个红军战士都被刽子手残忍地铡死了，等轮到刘青山的时候，敌团副看这孩子一脸稚气，怎么看也不像共产党，还以为是不小心抓错了，于是就糊里糊涂地把他放了。

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个小战士是谁，直到1941年组织上审干的时候才弄清楚，他就是安国县的刘青山。他虽然在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却居功自傲、贪污腐化，最终也逃不过枪决的命运。当然这是

后话。

那么，高蠡暴动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描写这场农民暴动的《红旗谱》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侠肝义胆，革命先烈如何用血肉之躯留下英雄传奇？

热血柔肠，文学作家怎样执丹青妙笔写出红旗赞礼？

高蠡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震动了全国，触动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心弦，就连远在上海的鲁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高蠡暴动也深深烙印在另一个人心上，他就是河北保定蠡县的作家梁斌。1932年高蠡暴动发生的时候，梁斌才十八岁，正是这场惨烈的农民武装革命，让他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跟敌人战斗。

1934年，梁斌写了第一篇关于高蠡暴动的短篇，题目是“夜之交流”。后来，他又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直到1953年，三十九岁的梁斌感觉心潮澎湃，提起笔开始创作鸿篇巨作《红旗谱》。

这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梁斌的夫人回忆，在创作《红旗谱》的时候，梁斌就像傻了一样，给他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是只要你跟他谈起《红旗谱》，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那时候他脑子里除了《红旗谱》什么都没有。夏天和别人聊完天，他总是忘拿扇子，结果可好，一个夏天丢了一百多把扇子。

当时梁斌撂下话说：“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终于在1956年底，《红旗谱》问世，1958年得以出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从此之后，朱老忠成为农民英雄的典型。

《红旗谱》不但重印了二十多次，还被改编成话剧、评剧、河北梆子，还被搬上了电影大银幕。1960年由崔嵬主演的《红旗谱》就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说到梁斌和《红旗谱》，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黄胄。黄胄画驴是中外一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黄胄原本姓梁，而且跟梁斌还是本家堂兄弟。

黄胄老先生早已去世，笔者曾经采访过黄胄的夫人郑闻慧老师，了解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小说《红旗谱》一再刊行，出版社打算出版豪华本送瑞典参加书展。编辑就问梁斌：“咱们得请画家来绘制插图，你觉得请谁最好呢？”

梁斌想了想说：“有一位画家黄胄好像也是蠡县老乡，可能熟悉保定的风土人情，请他合适。”

但是一开始，黄胄并没有答应，只是想和梁斌见一面。没想到一见面才发现，两个人竟然是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本家兄弟。一本《红旗谱》竟然使哥俩重逢，也是一段佳话！

黄胄接下任务，认真阅读了小说，跟堂兄梁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还回到保定老家找来不少乡亲去写生。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先后画了两套插图，分别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如今这两套画稿已经成为新中国革命题材人物画中的经典作品。

在拍《红旗谱》电影的时候，主演崔嵬还曾经拜访黄胄，而且还以黄胄插图中的朱老忠画像作为参考。由此可见，黄胄画的朱老忠等人物形象也已经深入人心。

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是直接从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可是电影《红旗谱》却是从话剧《红旗谱》直接移植而来的。

河北省话剧院建院之初，演了一部话剧，顿时引起了轰动效应，这部话剧就是《红旗谱》。十年前笔者曾走访了剧中的几位主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村里老师，他扮演的就是瞎子朱老明。

话剧《红旗谱》反响热烈，1959年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轰动了北京城。朱德、徐特立等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老舍、夏衍、欧阳予倩、田汉等文艺界专家也对此大加赞扬。

这样一来，《红旗谱》引起了当时电影界的大导演凌子风和演员崔嵬的注意。

他们一拍即合，把《红旗谱》搬上了大银幕。

挑选演员还真是个不容易的差事。凌子风导演在话剧原班剧组中，挑来选去，只选中了村里一个人，他扮演的角色没有变，还是朱老明。而在影片中，他拄着拐杖喊着“朱虎子回来了——”的画面，生动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影片开拍前，导演凌子风一再告诫村里：“朱老明的眼可是气瞎的。”于是村里决心把朱老明塑造成睁眼瞎，突出他的硬汉形象。

可别小看这个角色，要知道当年村里才二十多岁，却要扮演一个五十多岁的睁眼瞎，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村里多次走访两个农村的盲人，仔细观察他们眼睛的变化和形体动作特点。每天村里都要花很多时间吊眼球，因为太过疲劳还落下了毛病，等影片拍完很长时间他的眼睛才恢复正常。

一个睁眼瞎朱老明已经很出彩了，却不是最出彩的，最出彩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崔嵬扮演的朱老忠。可奇怪的是，每当人们向崔嵬祝贺时，他却总是十分遗憾地说：“那叫什么表演，简直不能看。”

崔嵬为什么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呢？他不满意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崔嵬曾经设想，当朱老忠听到被批准入党后，高兴得是不知怎么样才好了。他回头看见墙上挂着的七节鞭，拿起来就出去大耍一阵，什么撒花盖顶、枯树盘根、白鹤亮翅、鹞子翻身。等到他的老婆背柴火回来看见了，心想着这老东西八成是疯了。朱老忠把鞭子一收对老婆说：“去给我打酒，割二斤肉包饺子吃。今天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日子！”

崔嵬认为，这样的镜头跟那些用河流、天空、松树等象征性的空镜头相比，来得实在、有力度、有人情味，更能表现朱老忠的感情。

崔嵬的想法得到了凌子风的赞赏，两个人连夜修改剧本，第二天重新补拍了朱老忠激情耍鞭、老伴喜包饺子的戏。

原本是非常有创意的一幕戏，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影片送审的时候却遭遇了麻烦。朱老忠耍七节鞭庆祝入党的那一幕，被认为太不严肃。尽管崔嵬据理力争，但是那个画面还是被剪掉了，无缘跟观众见面，这也成为这位老艺术家心口永远的遗憾。当然瑕不掩瑜，崔嵬塑造的朱老忠依然是荧幕上响当当

的硬汉子。

经典永远都是经典，2003年电视剧《红旗谱》在河北顺平和天津宁河开拍，2004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一次“农民演员专业户”吴京安扮演朱老忠，巍子扮演冯桂堂，而村里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老驴头。他们的表演，将河北农民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再一次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带领着观众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感受硝烟弥漫、激情燃烧的岁月。

峥嵘岁月，文学艺术如何展现英雄壮举？

几度春秋，英雄后代怎样传播英烈事迹？

《红旗谱》中朱老忠的人物原型主要取自1932年高蠡暴动领导人之一的宋洛曙。那么，这位英雄的后人现在又在何处？又在做什么呢？

话说1932年，宋洛曙在高蠡暴动之中壮烈牺牲，而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即将分娩。就在宋洛曙牺牲十五天后，他最小的儿子宋保安出生了。可惜的是，宋保安连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子都没有亲眼看到过。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想要斩草除根，暴动烈士遗孀生的男孩都要被处死，形势十分严峻。该怎么办才好呢？

宋洛曙的妻子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到处流浪，吃了不少苦头。直到解放后，党组织才在一座破庙里找到了他们，结束了他们一家人长达十七年的苦难生活。

宋保安之前在保定地区汽车制造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这几十年宋保安在工作之余，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搜集高蠡暴动文物资料，用于筹建高蠡暴动纪念馆。

这些年，宋保安利用业余时间 and 老伴一起深入高阳、蠡县一带走村串户，访问高蠡暴动的参与者和知情者，还多次往返天津、北京、石家庄、上海、内蒙古等地，拜访参加过高蠡暴动的老同志及其亲属。

这几十年的工夫也没有白费，宋保安老人收集到了很多文物资料，包括游击队用过的片刀、红缨枪等实物，还有敌人杀害烈士时使用过的铡刀，此外还

有当时张贴的标语、布告、传单、报纸等重要资料。

高蠡暴动纪念馆建成后，这些文物和资料大部分成了纪念馆的展品。而高蠡暴动中的那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将会永远激励着后代子孙。

朱璉开诊所
地下党昭昭

上一回说到，高蠡暴动烈火生，红旗谱上写丹青，那段老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那么样的激动人心。这一回要讲的是另外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故事的开头远在七十七年之前，发生的地点却近在我们身边，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这其中又发生了怎么样引人入胜的情节？再回首，穿越到1936年的3月，在老石门西横街爱华里一号，故事的主人公在一片掌声之中登场了。

1936年3月，正是草木拔节的时候，那会的老石门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家名叫“朱璉诊所”的私人医院开张了。各路的名流纷纷来贺，明晃晃的铜牌高挂门前，这么瞧上去这诊所的主人准是个来头不小的名医，她到底是何方神圣？又有着怎样的神通呢？

1932年，正太铁路医院里来了一位姓朱名璉的女大夫，这个原籍江苏的年轻女人和丈夫陶希晋一起从南方来到了北方。

朱璉在老石门里扎下了根，为这片地方上的老百姓们除灾祛病。那时候好多人去看病，就是奔着朱璉的名字，可按说大家上医院看病，一般都是瞅着哪位医生面相老成，才愿意去找人家求医问药，这么着才觉得心里踏实。可是，这朱璉当年还属于铁路医院里的新生代，大伙为什么都愿意排着队去捧她的场呢？

这事说起来还得夸人家朱璉的为人，她虽然是个文静端庄的女人，走在大街上都不怎么起眼，可是她在当年的老石门可是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朱璉刚刚穿上了铁路医院的白大褂，就没白天没黑夜地背着药箱子到处巡诊。不管风有多大雨有多急，朱璉头上的工作从来没有耽误过。当时正太铁路局的工人子女

差不多都是经了朱璉的手才来到人间，尤其是那些难产的孕妇到了鬼门关，都是由朱璉一把手拉了回来。因为这样救命的事，很多孩子都认了朱璉做干妈。

穷苦人们提到朱璉，都把她当成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而她不只为穷人们扶危济难，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她也挺吃得开。那会老石门里著名的美孚洋行行长的太太也在生产的时候也被朱璉救了一命，从此以后那家人就把朱大夫当成了至亲。

再看朱璉的丈夫陶希晋，他出门总是西装革履，一身体面的行头，说是个阔气的大老板，没人会不信。

朱璉夫妻工作忙是忙，家里却总是摆着一张四方的麻将桌，得空的时候，家里便是谈笑有大腕，往来无白丁，灯火通明热热闹闹，有头有脸的人物坐的一屋子都是。这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朱璉谈的不是张家长李家短，而是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抗日的主张。

这位妙手回春的朱大夫，在白大褂下面藏着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朱璉手里推的是麻将牌，胸膛里跳动的却是一颗红色的心。就像电视剧《潜伏》里那位开诊所的孙明仁一样，她在人前是一名医生，暗地里却是一位中共地下党。

他们夫妻二人来到石门，不久之后就被介绍入党，朱璉成了石家庄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丈夫陶希晋也在1936年1月成为中共石家庄市工委的书记。为了掩护同志，便于工作，朱璉辞去了正太铁路医院的工作，开了这家私人诊所挂牌行医，于是就有了开头那热热闹闹的一幕开业盛况。

那时在老石门的地面上，东风西风两派纷争，这边朱璉诊所刚开张，马路对过的一处宅子里就出现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这些人就是国民党的特务，那里就是他们的据点。这些特务打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装成敲铜打铁的工匠，贼眉鼠眼地盯着朱璉诊所里的动静。朱璉夫妻二人冷眼旁观，沉着应对，硬是没叫他们占着什么便宜。

为了争取革命力量，朱璉以柔克刚，就是上门看病的国民党军警，她也是一律笑脸相迎认真诊治。久而久之就连这些原本心怀鬼胎的人物也真心真意地感激朱璉，每次搜查开始之前，都有人偷偷来通风报信，或者干脆在诊所门前贴上一张纸条，表示：鉴定完毕，这家都是良民。